

烟台故事

两个人的出版社

宋世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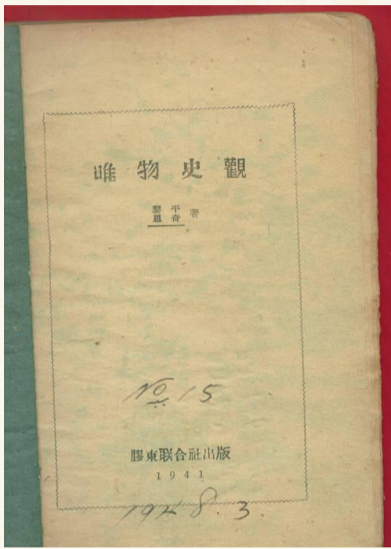
新中国成立60周年那年,《人民日报》曾刊登一位资深学者的文章,作者在文中提到,自己在北大读书时,第一次看到了《共产党宣言》。那时敌伪对进步书籍搜查很严,这本出自“胶东联合出版社”的“违禁书”,在秘密流传中已磨损严重……可能这位学者还不了解,当年在华北敌占区乃至更广阔区域出现的许多名著,实际是由胶东大众报社出版发行的。报社对外挂两块牌子,门里是一户人家。很长一段时间内,“联合出版社”业务仅由一人管理。

1938年秋,大众报社由黄县(今龙口市)莱山院迁至掖县马台石村后,印刷厂在承印每期约2000份报纸外,还遵照上级指示,以“胶东联合出版社”名义,翻印了《共产党宣言》《联共党史》《中国共产党党章》《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》等一大批书籍,除在解放区发行,还通过各种渠道向敌占区输送。为什么报社要以出版社名义出书?原来这两个单位是一对“孪生兄弟”,在1938年夏季先后诞生于黄县莱山院,印刷机械和技术工人都是报社原班人马。为充分发挥工人、设备潜力,出版书刊及报纸两项工作自然融为一体。对此,就是根据地的军民也大多不明底细。

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驻古巴、扎伊尔特命全权大使的李善一,当年有这样一段经历。1938年11月,胶东特委青年部部长林乎加得知李善一这位不满17岁的部下爱好美术,便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大众报社社长兼联合出版社社长于寄愚同志,推荐他到联合出版社工作。李善一平时读过许多出自联合出版社的书刊,断定这是个机构齐全的单位。当他兴高采烈地赶到社驻地马台石村报到时,没想到接待他的竟是一位面黄肌瘦、身材矮小、不修边幅的小老头。没有集中办公的房舍,不见伏案审稿的编辑,主人身边只有一张小书桌、一个饭盒。原来,名声显赫的联合出版社,从编稿审稿到包装设计,全靠面前这位长者——大名鼎鼎的社长于寄愚一人负责到底!

此时,于寄愚见有新人到来,喜形于色,立即安排李善一到旁边屋子住下。一个破木箱作板凳,土炕就是办公桌,炕上铺着薄薄一层麦秸,中间因土壑断裂还塌下一条洼坑,窗户纸几乎都被风吹掉,晚上寒风刮得残纸碎片沙沙作响……李善一只能裹紧棉被,躺进炕上那条洼坑,和衣而眠。每遇下雪时,窗台、炕面到处都是皑皑白雪,人就像露宿野外……

由于增印书刊,原有印刷器材损耗加剧。当时,不仅印刷设备,就连油墨纸张等材料也被敌伪当局列为禁运品,威胁报刊正常出版的困难一个接一个。报社没有制版设备,更没有铸字机,印报时只能将铅字排版后直接上机印刷,时间稍长,铅字就磨秃了。创刊时用的铅字大多磨损,像“抗战”“斗争”“民众”等常用字都已模糊不清,印到纸上只能算“象形文字”,特别是那个“的”字,使用频率高、磨损重,不管印书印报,印出来便是一个黑团。报社不能铸字,解放区又一时买不到铅字,各部门都找社长告急!于寄愚看似严肃,不苟言笑,身上却有股



胶东联合出版社1941年出版的书

使不完的劲儿。他不慌不忙,一面教工人绘画、写字,扩展工作技能,一面向大家征询应急办法。有人提议,将磨损的铅字屁股用小锤敲扁拔高,让它“踮踮脚”,充个“大个儿”。此法一试,果真解了燃眉之急。照明的煤油用完了,工人夜间拣字时,把半截蜡烛粘在字托上。蜡随人走,半明半暗,在字架中往来穿梭,活像耍龙灯!蜡烛断供,便用饭碗盛点花生油,放进两条棉芯,吊在字架上。尽管昏暗,凭记忆也能摸准需要的铅字。只是一个班下来,手被铅字染黑,脸和鼻子被油烟熏黑,人人变成小花脸,相互对视,都忍不住笑出声来……于社长晚间要改文章,还得看报样,图方便,许多文章就在车间写,实在熬不住了,卷着大衣在字架下面打个盹,以便工人有什么事可随时叫他。

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,报社出书任务有增无减。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,为团结大多数人共同抗敌,报社人员来自四面八方,成分较复杂,为此,党组织还不能公开,在接到承印《中国共产党党章》的任务时,只能秘密进行。党员周居宾、于本文、李征夫等同志,白天与其他人一样坚持日常工作,晚上再悄悄返回车间接着干,眼熬红了,心里却为能参与这项光荣任务而高兴!

1940年11月,联合出版社与大众报社正式合并了,从此,胶东大众报社不仅出版,同时肩负印刷发行图书的任务。经过印刷工人和校对人员共同努力,克服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困难,印刷出版了《联共党史》《唯物史观》《大众哲学》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等,还有大批马列主义原著,如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反杜林论》等,这些书籍还被加以精装,作为干部必读的理论著作。在文艺小说和剧本方面,有《阿Q正传》《呐喊》《甲申三百年祭》《小二黑结婚》以及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静静的顿河》等,另外,还印刷胶东军协、胶东青联主编的几种刊物及军队的《前线报》《胶东画报》、军用地图和各种宣传品。据统计,在《大众报》出版发行的近11年间,先后出版图书86种,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类图书20种,哲学类3种,社科类61种,综合类2种,成为胶东军民唯一的精神食粮生产基地。

怀故人

我的姥爷冯玉南

刘斌

我姥爷冯玉南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人民英雄,他的言行每时每刻都彰显着一名共产党员、优秀退伍军人的赤诚与担当。虽然他已去世多年,但他那瘦削干练的身影时常在我眼前显现,他那洪亮有力的声音也时常萦绕我耳边。

我姥爷是栖霞市蛇窝泊镇(原大柳家乡)玉皇庙后村人,17岁参军,后加入中国共产党,曾参加过著名的济南战役,他也是在这场战役中光荣负伤的。

记得姥爷说,当时战斗异常激烈,炮火连天,在进攻王耀武指挥部院子外围时,姥爷的腰、左脚被炮弹炸伤,在后方野战医院做了手术。左脚因伤变形,从此只能拄着拐杖。我曾亲眼看到,下雨阴天时,姥爷常会将手支在腰上,疼得直冒汗。

革命胜利后,姥爷被评为二等甲级功臣,返回老家,成为一名朴实的农民。姥爷是共产党员,为人耿直,待人热情,公私分明,很受群众拥戴。尽管他腿有残疾,但还是被选为生产队里的保管和埠后片的片长。在抗美援朝时,人们纷纷为国家捐钱捐物,支援前线,姥爷二话不说就捐出了一级军功,成为二等乙级,本来就不多的伤残补助,这下更少了。那时候妈妈才4岁,家里生活条件很差,都是吃地瓜干、菜团菜渣等,连玉米面饼子都很难吃上。姥爷捐出一级军功后,姥爷和有些乡亲不理解。姥爷却说,自己的好多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了,他们连新中国都没有看到,自己活到现在,已经很满足了。党和国家已经很照顾我们了,在困难时期,我们怎么能不为党和国家着想呢?

在姥爷当片长时,因为他为人公正,敢于担当,乡亲邻里有了纠纷,都愿让他来帮忙解决。于是,无论烈日炎炎,还是寒风刺骨,大雪飘飘,姥爷总是拄着拐杖,拖着残腿,往返奔波二三十公里,为乡亲们化解纠纷。有一年开春,邻村一对夫妻吵得不可开交,原因是媳妇刚从娘家借回来10公斤小麦,但丈夫在带来的半路上掉了,怎么找也没有找到。那时候,这些小麦可是一般人家近一年的细粮,家家平时舍不得吃,而这些麦子还是夫妻俩借来准备盖新房伺候瓦匠的。姥爷拖着残腿,顶着寒风,去邻村了解情况

后,劝了夫妻俩半天,可那家媳妇呼天号地,非要离婚,不能过了。姥爷拖着残腿回了家,把家里仅有的半口袋麦子背着送到了他们家。夫妻俩感动得热泪盈眶,说啥也不要。姥爷把小麦一放,说,麦子没了可以再种,家没了可就没盼头了。多年后,日子好过了,那家人却一直忘不了这件事,见人就夸姥爷人好。殊不知,那年,姥爷一家吃了一年的粗粮。可是姥爷却无怨无悔,在他眼里,乡亲们过得好了,比什么都好。

生产队保管,也算是个有“实权”的职务,负责平时生产物资的存放、领取,地瓜、玉米、大豆、小麦、谷子、花生等交完公粮后剩下的一人库,都要经过姥爷的手。姥爷脾气倔强,公私分明。他家就住在生产队大院旁边,但是他却没有私自拿回家一粒公家的粮食、一件生产物资。当时,就是掌握着记工分权力的生产队长要领取物资时,没有村委的批条姥爷也不允许,为此他不惜得罪人。有一次,生产队种完了花生,剩下些种子要入库。年幼的我跟在姥爷屁股后面,哭着要花生吃,姥爷不给我。我偷着抓了一把,被姥爷发现,一把夺了下来,还在我屁股上踢了几脚。我哇哇直哭,最终也没吃到一粒花生。有人笑姥爷傻,他总是憨厚地一笑,说,公家的就是公家的,咱不能占公家便宜。时间久了,乡亲们竖起大拇指说,有冯玉南当保管,我们放心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正值年少的我,经常跟姥爷去村南氨水池放氨水。氨水是生产队在庄稼地里使用的肥料,有一股刺鼻的气味。在生产队使用量大的时候,姥爷就钻进池子里,打开开关放氨水。我常常看到姥爷被熏得一把鼻涕一把泪,可是忙完了之后,他依然笑眯眯的。我很好奇,就问他,气味这么难闻,为啥你非要干这个呀?姥爷就会笑着说,我遭点罪没啥,只要庄稼长得壮实,咱老百姓啊,就有饭吃了。

姥爷就是这样一个人,朴实无华,热心真诚,一生公私分明,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、退伍军人的初心与使命。虽然姥爷已经离开十几年了,但他却一直活在乡亲们的口碑中,他的形象也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。

本版稿件由《胶东文学》特约刊登

胶東文学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
CN37-1530/1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
ISSN1002-3623

创刊于1982年 2021年再次全国公开发行

● 编辑部电话:
0535-6821982● 发行电话:
0535-6821983● 本地投稿信箱:
jdwxbd@126.com

邮局订阅二维码



胶东文学微信公众号